

台灣第一咖啡味 CAFÉ Lion

台灣咖啡館文化

沈孟穎

國立台南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講師





現任：台南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兼任講師

學歷：成功大學建築系博士班(仍就讀中)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碩士

經歷：台南科技大學室內設計課程兼任講師
世新大學通識課程 多元文化與文化人類學課程兼任講師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研究助理
名匠設計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展示企畫

代表著作：咖啡時代－台灣咖啡館百年風騷

授課大綱：一、西方與咖啡館文化相關的各式各樣想像與論述
二、以時間為貫穿，討論台灣咖啡館的出現、發展及轉化的歷史脈絡
三、討論台灣咖啡館獨殊的文化、空間形式、及室內設計美學
四、咖啡館內衍伸之各種議題討論
五、世界的咖啡文化遺產

參考書目：1. 沈孟穎(2006)《咖啡時代－台灣咖啡館百年風騷》，台北:遠足。
2. 陳柔縉(2005)《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台北:麥田。
3. 張耀文・攝影（1995），《打開咖啡館大門》，台北：時報。
（1997），《咖啡地圖》，台北：時報。
4. Wolfgang Schivelbusch (2001)《味覺樂園》，台北：藍鯨。
5. 王士文（2001）《當咖啡香氣瀰漫法國街頭－論法蘭西咖啡館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
6. 丘彥明（1985），〈從「玻麗露」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館探索〉《報導文學》，pp.174-189。

台北咖啡館（文藝）公共領域之崛起、發展與轉化（1930s-1970s）¹

The Coffee Shop in Taipei: The Rise,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Public Sphere (from 1930s to 1970s)

沈孟穎

摘 要

本研究的研究角度，乃是闡述台北咖啡館在台灣文藝公共領域崛起、發展、轉化的過程中所扮演之歷史角色，及其文化意涵與空間形式之特殊性又如何影響文藝公共領域的形構與演變。理論架構以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觀點出發，著重討論台北咖啡館與文藝公共領域相互形構之過程。研究方法上採取文本分析法，蒐集大量描述真實/虛構咖啡館的相關文本為分析資料，再佐以史料相互對照，以此定位台北咖啡館於消費文化的歷史角色。另外，將研究的時間點鎖定在 1930-1970 年代間（1930s-1970s）之時空背景之下，以社會政經結構之轉變作為分期之標準，分別為日本殖民末期（1930-1949）、光復初期（1949-1960）和經濟發展期（1960-1970'S）分期討論“台北咖啡館對於形構台灣文藝公共領域，所扮演之歷史角色與地位”與呈現出的多種樣貌。

關鍵字：咖啡館、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文學公共領域

¹ 本文於 2000 年發表於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學術研討會——多元與差異。



壹、咖啡館文化相關研究之偏跛

縱使台灣的喝咖啡人口眾多，咖啡館的開設更是有如雨後春筍般的蔓延，有關台北市的咖啡館之相關研究卻是明顯不足。查閱國內碩博士論文相關研究，可以大致分為三種傾向：第一類型以咖啡為主題的產業研究，這一類研究多是將咖啡視為經濟作物，討論其效益與農業上的發展為研究主題。第二類型以商業利益為導向的咖啡館管理研究，這一類研究以消費者研究為導向，以顧客滿意度、市場區隔調查為主（林吟春 2000，鄭秀香 2001，王秀瑩 2000），並且，其研究起源與對象，多與十年來興起的連鎖咖啡館有關。第三類型研究與消費文化相關，也以空間的角度切入，如《跨國娛樂資本的空間生產——以台北星巴克為例》（蔡文芳 2001）論文為代表，但是這一類的研究多將關心的角度置放在近來熱門的文化霸權與全球化跨國消費的概念下，闡述咖啡館在跨國資本流動過程中的空間生產，而無法以歷史分析之角度觀看台灣的咖啡館文化發展。

在咖啡館文化研究中，唯一以歷史分析角度看台北咖啡館文化，只有范婷〈從波麗露到星巴克——台灣咖啡文化的歷史分析〉一篇（范婷 2000），以上的幾篇咖啡研究，固然可以提供我們從經濟的、商業的、文化的角度更加以瞭解台灣的咖啡文化，但是這些論文提供的多是 1980 年以後的咖啡館文化，即使是范婷對於台灣咖啡文化的歷史分析，也僅利用報章雜誌中所呈現的廣告與文章作為分析之重點，著重在空間在平面媒體再現的層次，卻未對於實質的空間型態與活動進行分析，並不足以如他所期許的建構出台灣「咖啡消費文化史」之宏願（范婷，2000：44）。但是，范婷仍提出了值得深思的台灣咖啡文化的趨勢變動，以經濟發展、文化實踐以及社會關係為基調的歷史性分析面向，足以作為本研究對於社會、經濟和文化環境背景資料的前導。本研究將焦點集中於實質空間（咖啡館）的表現與再現於文章與各類媒體中的相互關係，以及背後所代表的意識型態與整體的空間文化形式。

貳、時間的分期

本研究的開始，在所發現的文獻裡出現咖啡館的資料，可以溯至日治時期昭和三年（1928 年）的《台北市六十餘町案内》中出現，所謂“案内”（類似於現在的工商名錄），裡頭記載 21 家 一（咖啡店）包含喫茶店之店名、坐落位置、經營者，這是目前所能蒐集的最早咖啡館資料。又 1935 年昭和十年的《始政四十週年台灣博覽會紀念台北遊覽案内》，這張地圖裡也記載了 13 家的咖啡館（包含喫茶店）。研究者大膽定論，即使咖啡館的出現可能更早於 1928 年，但是至少在 1928-1935 年間，咖啡館的數量才是大量增加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1928 年的 21 家 一（咖啡店）包含喫茶店裡，用其分布的地理位置來分析台人所居住活動的大稻埕其咖啡店之數量消長，才是了解屬於台灣人的咖啡館興盛的重要參考。當時在大稻埕也就是太平町、永樂町，只有 3 間登記有案，而至 1943 年（昭和 18 年）時，咖啡店的數量已經成長至 15 間。所以，本研究的時空範圍，便鎖定從 1930 年代開始。

對照許俊雅與方孝謙二人關於殖民時期的小說與認同研究（許俊雅 1995）（方孝謙 2001），比較許俊雅與方孝謙的時間分期：許俊雅將台灣新文學運動分為三時期，第一階段是 1920-1931 年，第二階段是 1931-1937，第三階段為 1937-1945 年。方孝謙則是將殖民時期分為，1895-1915 年的敘事認同，1920-1930 年的民族認同，1931-1945 的兩極認同（庶民與菁英認同的二極）。許俊雅的時間分期以新文學運動的發展為主軸與社會運動相對照，方孝謙則是以日治時代文官與武官總督交叉分治的三個時期分類。交叉對照的結果，可以將我們要討論的 1930 年代置放於二者的第三階段，因為二者的第三階段皆是以日本政府對台灣進行皇民化運動開始，這個運動不僅是在政治與經濟上統治台灣，更是是根植文化上的深層統治力量。在第四章中將詳加敘述 1930 年以後至國民政府來台接收的 1945 年之間的社會經濟文化特徵。

至於將研究的範圍拓展至 1970 年代的原因，亦是考慮台灣的特殊歷史環境脈絡。經過日治時代（1895-1945）的統治之後，國民政府來台接收台灣，接著社會發展的特徵是全民從貧窮社會走向經濟發達時期（1945-1960），1949 年至



1960 年間台灣受到美國的經濟援助，不但幫助台灣的經濟發展，也使得台灣社會成為美式文化的附庸，陷入只要是西方文化都是現代的進步象徵的迷思，這種迷思也同樣的展現在咖啡館空間之文化形式當中。這個時期的社會特徵是共體時艱、客廳即工廠、人人皆工人的經濟發展時期。自 1970 年起台灣進入消費時代²的開始，經濟的環境與人民收入急起直飛的時期。陳光興（2000）認為台灣與香港、漢城、消費社會的形成的雛形始於 1970 年代後半期。台灣的咖啡館文化雖然從開始至現在，歷經了將近八十年（約 1928 至 2001 年），而 1975 年之後咖啡店跟隨著資本全球化的腳步，進入了消費時代之連鎖性、世界性、一致性的消費方式與空間特質。所以，最值得本研究討論的時空背景，應該是 1930 至 1970 年之之間台北咖啡館的空間角色轉變，以及其對於城市中生活者的象徵意義。

參、 “公共領域”之文獻回顧

一、公共領域的基礎與特徵

哈伯瑪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一書中，自述其主要論述的目標是在於闡明資產階級在 18-19 世紀初英、法、德國在歷史情境背景下公共領域的理想類型與轉型。在其“公共領域”概念中，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基礎必須建立在工業化社會後新資產階級（bourgeois）的興起—法律上所賦予的私人財產的觀念，使得公領域—國家與私領域—家庭之間，必須有一種機制聯繫與分離私人領域與國家公領域的範圍，以確保國家權力不致侵犯私人權力，而達到一種制衡的力量。而這種新力量的興起也正因為資產階級擁有“教育”與“財富”的培養，使得身為平民的資產階級能像貴族階級的人們一樣，學習理性分析事務與參與公眾的辯論之能力，

² 陳光興（2000）在「亞洲城市中華人的文化生產論壇」上發表〈台灣消費社會形成的初步思考〉一文，認為台灣與香港、漢城、消費社會的形成的雛形始於 1970 年代後半期。鞏固表現在 1980 年代末期，而其深化則發生在 90 年代中期...

並期以創造或是改變自身週遭的美好世界 (Harbermas1989)。古典的自由主義的市民社會理論延續著希臘人的城邦 (Polis) 以及後來的羅馬共和時期的概念，反對王權而主張統治的力量必須由人民同意，並且同意“城邦”的政治實體是“市民社會”的起源 (沈樹華，1999：565)。不管是洛克、托克維爾、黑格爾、或是馬克思都對於“市民社會”勾畫出不同的意涵，原則上皆將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作釐清。托克維爾認為：「在社會生活中畫出一個領域來禁止國家的架構，這個領域來禁止國家染指，這個領域叫做『市民社會』」(王韶光，1991：107)。黑格爾則是將“市民社會”視為歐洲中古封建社會瓦解後的一種新的社會關係，而這種社會關係來自於新的中產階級的興起 (沈樹華 1999：566)。而城市中的新興中產階級出現在街頭時，不僅僅是穿越或是停留在城市中的某處，而是藉由身體的出現 (appearances) 展現中產階級的社會地位與階級特徵，最為明顯的是衣著上的裝扮與走路的身體姿態等等 (Sennett，1992：65)。哈伯瑪斯與森涅特皆認為公共領域的基礎與資產階級的興起是歷史情境相關，並且在社會場域中參予公眾生活的身體，具體展現市民與國家領域統治的權力鬥爭。³

哈伯瑪斯並指出「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的產生是建立於都市的市民生活中理性論辯與公共空間的產生，源自 17 世紀的法國「文藝沙龍」(salons)、英國「咖啡館」(coffee house)、德國「餐桌社團」(table society) 之成立。更早可追溯及「市鎮」的興起，因為經濟因素而成為市民生活中心，都市中的布爾喬亞需要可以參與公領域之場所，並藉以對抗貴族階層或是統治階層。所以在西方歷史脈絡下，相對於市鎮的經濟因素，在文化政治的影響下出現咖啡館、文藝沙龍、餐桌社團等公共領域。“咖啡館”也被哈伯瑪斯認為是實踐公共領域的場所之一。其“實踐的涵義”最重要的特徵在於參與的個體成員“自我意

³如哈伯瑪斯比較“代表型的公共領域”(Type of representative publicness) 和“資產階級公共領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 二者不同之處：「代表型的公共領域的出現與發展與個人一些特殊標誌是密切相關的：如權力象徵物(徽章、武器)、生活習性(衣著、髮型)、行為舉止(問候型式、手勢)以及修辭的方式(稱呼形式、整個正規用語) ... 一整套關於高貴行為的繁文縟節」(Harbermas，1989：8)。在這種種的繁文縟節中身體並沒有失去意義，在封建制度社會裡的公共領域是藉由貴族的社會地位展現，完美的德性³必須依賴身體表現，並且公開的展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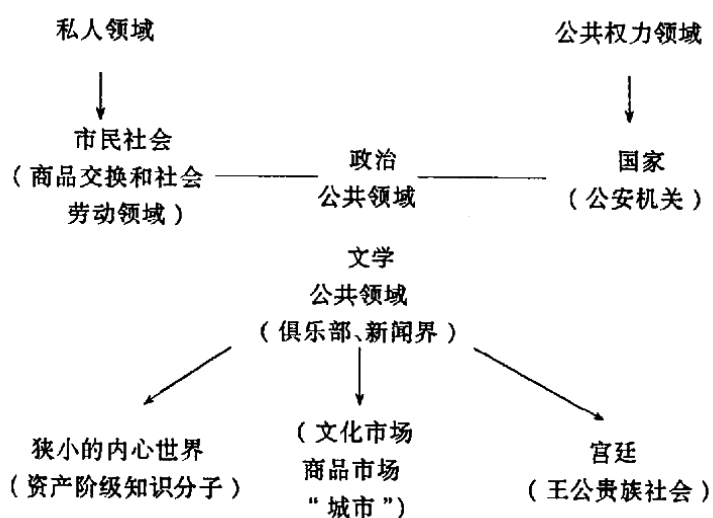


識”存在於所處公共領域中的理性思維，經過批判與創造了實質的文學作品或是評論世事的作品。正如哈伯瑪斯說：「salon之於知識份子與貴族相遇之處；而文學之於咖啡館，也必須給自己一個合法地位」（Habermas，1992：33），這些在咖啡館內醞釀的公共意見（public opinion）在特定的公共領域下經由理性辯論與思考後，發表的口頭言說、溝通或是文字書寫形式，形成公共意見－「輿論」⁴，就有其合法性與正當性。正因如此“咖啡館”即被視為「文學上的公共領域」的開始。在哈伯瑪斯的論述中，也正因為這些文學的公共領域的產生，所生產的文化產物便以影響著多數的市民，希期藉此達到市民參與公共事務能力與權力，最終目的乃是邁向政治辯論的公共領域（曾慶豹，1998：51-55）。社會關係具體的呈現在言談的行動中，言談事實上是一種符號而非象徵（Sennett，1992：73）。而“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則是建立在一個新興的“閱讀”群體上，這個閱讀的群體可能是非貴族的知識份子、作家、律師、更重要的是大量增加的手工業者與小商人中間階層，於是這個新型態的社會交往模式，不是建立在“社會地位”的基礎，參與的成員多半不是貴族而是某個同業工會的成員。“言談與論說”成為主要的身體表徵，以私人領域為出發並且與看重公眾利益相關的主體性私人經驗。然而必須注意的是，這裡所指涉的公共領域仍是“一群有教養、舉止得體的階層”而非一般平民階層。哈伯瑪斯所常用的字“Öffentlichkeit”：在許多的德國理論家的理論中也經常被使用，但是這個字其實擁有多重的意涵在其中，一是「公開」與「公眾」的意思，也可以進一步延伸為一個公共的群體所建構的公共概念，並透過某種規則或是程序，發展一種開放的、彼此可以在相互討論的方式，來構成一種大家均等的認同、與公共性產生。另一種則是含有空間的意涵在其中的「開放空間」的概念，表現在一般社會的場域與社會的空間中（曾慶豹 1998；廖炳惠 1993）。在不同的語文系統中，公共領域含有

⁴ 社會學辭典《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lopedia》（1991）

Public opinion—輿論：指在特時間，社會集團中注意某些特定爭議的成員，所作口頭文字或是非口頭文字的公開表示。任何公開表示意見，反映出對於許多不一致的看法之一的贊同，此一看法可能被接受為同樣公正、合理真實…。

不同抽象的概念，因此，在曾慶豹著的《哈伯瑪斯》中，進一步討論其譯文的轉借，將Öffentlichkeit譯作公共論域（Public Discourse）或是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而公共論域（Public Discourse）更具有「溝通辯論」之意，並且比較起「公共領域」更有實踐言說的立意。但是，在目前的相關文獻之中，大多延譯英文為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所以在本研究中暫不採取公共論域（Public Discourse）說法，以免造成論述中文意的混淆與誤解。



※引自哈伯瑪斯公共領域分析架構圖⁵

曾慶豹將哈伯瑪斯「公共領域」的概念歸納出四個特徵：（1）是私人和公領域統合的機制，惟有在公共領域中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批判的意義下，具體體現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自主。（2）是介入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進行調節的一個領域，並形成輿論。（3）在獨特的歷史條件下，與資本社會的形成有著直接的關係，是資產階級的公眾領域私有化。（4）是具體體現的生活場所，法國「文

⁵ Habermas, J. (1990/199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IT Press,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



藝沙龍」、英國「咖啡館」、德國「餐桌社團」的大量湧現，它的發展下不僅僅是受到販賣新聞的地方，政治性報章雜誌的出現推進...更是具體展現公民皆享有發表意見的權力（曾慶豹，1998：51-55）。Lakeland也認為對哈伯瑪斯而言，公共領域代表著：（1）實證的顯示出歷史的現象。在其中看出不同論述團體中，進行許多有關社會與政治議題的理性討論，這些討論並且會影響到公共政策之決策。（2）它創造出更多事件的可能性，以導致生活世界中體系的崩解。簡單的說就是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保障了民主政治的存在⁶。

總論之人們自我意識的穿上“公共的”大衣出現在街頭等公共領域，所進行的言談是一種符號與公共現象（public phenomenon）的試驗相遇（Sennett，1992：87）。人們在這個領域中感覺公共性的存在，也在這裡進出私人與公共的領域。由“私人領域”的個人身分關心公共議題，在此領域中與其他私人個體集合、組織結社，終極的政治目的在於“集體意志”的發聲。以這角度來看可以將集體意志的發生，視為此階層之政治的意識型態的形成，資產階級在政治的舞台上取代君權的統治地位，以理性公開批判取代統治，形成一個自律的內部結構。就實質上“集體意志”的展現則是透過“公眾的消息”經過“辯論”形成“公共意見”，最後成為“輿論”。而在這個由個人形成公眾的領域，具體體現自啟蒙以來對於“理性、辯論”之意識型態的追求，透過將眾人意志象徵化與意象化，將公共領域之空間情境達到世代相傳的“永恆”境界。

肆、 台北咖啡館裡文藝公共領域之樣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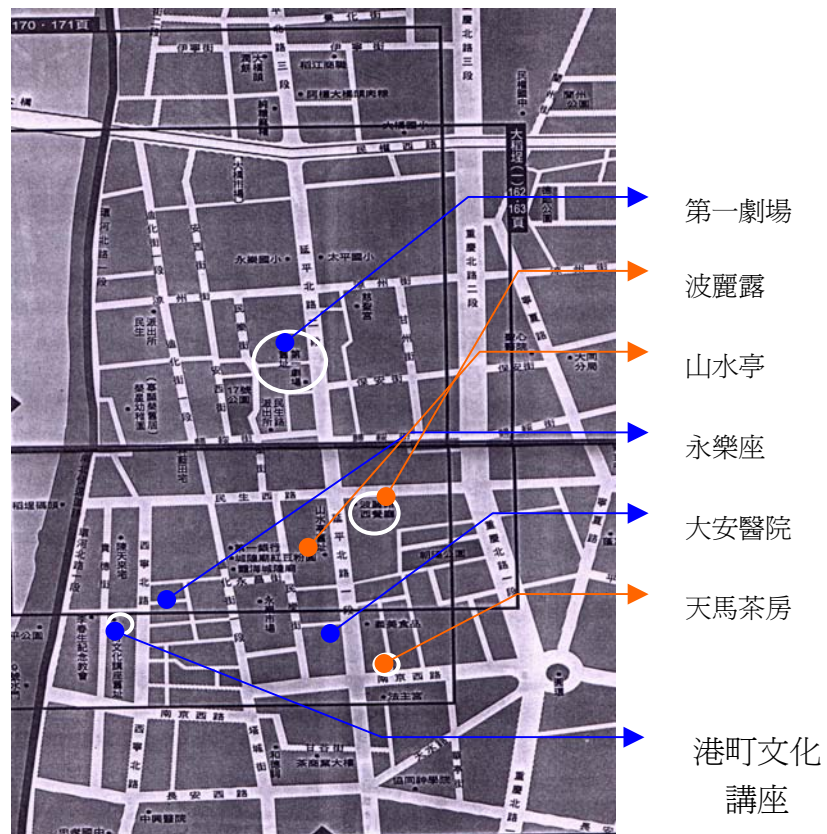
一、 日本殖民末期（1930 -1949）文藝公共領域在美術與戲劇界之崛起

楊照的文章〈只剩下咖啡館 只剩下星期一〉中的一段話：「對我而言，咖啡館是台北貧乏文明中的不得已，永遠成不了光榮驕傲。是因為我們失去太多東西，或是找不到以前本來屬於我們或者將來應該屬於我們的地方，所以輾轉

⁶ 轉引陳其澎（2000）。

流落到咖啡館…還想著我們沒有的人文傳統。一個在咖啡館裡讀詩、討論哲學、爭辯政治立場的人文傳統，我們只搬來了咖啡館。其他的依然遺留在文明的彼岸」⁷（楊照 1997），楊照的這一段話大概是所有愛好上咖啡館人們所共同的心聲吧！到底我們是為什麼上咖啡館呢？台灣人喝咖啡、上咖啡館之經驗無疑的相異於西方的咖啡館文化，然而這相異處究竟是什麼呢？如果我們只是移植了咖啡館空間形式，卻沒有移植包含其中的人文傳統，仍有值得探就之處，因為“移植”本身便擁有多重意涵，為何移植，如何只檢取想要的部分，如何的與自身的文化相容合成新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皆有助於使我們更加認識自己及我們所期望之生活世界。這些答案都必須在眾多的文獻與文本資料尋找，本研究擬以“台北咖啡館對於台灣文藝公共領域塑造，所扮演之歷史角色與地位”為中心議題進行討論。

首先說明在這個時期的咖啡館在整個大環境背景下，如何形塑著文藝公共領域之型態並且以何種方式運作。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漫長歲月裡，長期僅允許台人就讀有關美術、醫學、文學等科目，而



（圖一）大稻埕的文化活動與相關咖啡館位置

⁷ 原文引自中國時報 1997 年 11 月 21 日副刊。



不准就讀與政治、經濟、法律具有高度政治意涵，足以危害母國利益之科目。台人在政治上的不能自主，更將精神寄託於文學、戲劇、藝術等領域。即使如此，這些領域的發展仍是大受壓抑的。檢視皇民化政策之內涵：「在皇民化政策下，台灣總督加強推動諸多事項：『國語運動』（普及日語）—普設『國語講習所』，強迫台地耆老以暮夜之時學習日語，嚴禁報章雜誌之漢文欄，查禁漢文書房，削減台灣寺廟，禁演台灣戲劇，戲劇節目概用日語（及所謂改良戲）。禁以台語廣播，頒訂國語家庭、獎勵改姓日姓，要求台人祀『伊勢大神宮』之『大麻』以代傳統先祖之祀；推行『寺廟神升天運動』，焚毀各廟宇所奉祀之神像」（許俊雅，1995：108）。可見日人希望徹底改造台人成為“忠良的日人”用心之深。當時的台人與祖國之間仍是秘密往來，再加上當時社會環境與日人的殖民政策不公允下，台人希望回歸祖國之心也深切，許多有識之士便利用文章、戲劇、音樂、藝術之作品向日本政府作柔性抗爭。但此時期在咖啡館裡的文藝公共領域，美術與戲劇的表現相較於文學更為突出。而政治的公共領域則是展現在波麗露與天馬茶房的附近，由蔣渭水領導的非武裝抗日活動基地「大安醫院」、以及位於港町街的「港町文化講座」。蔣渭水等人利用講座與設辦刊物等方式，倡導非武裝抗日活動的思想。而又文藝公共領域之一的戲劇改革運動，則是在附近的永樂座、地一劇場上演的新劇則是由天馬茶房裡的小密室裡創造出來的。美術活動又是如何呢？美術界的展覽活動則是集結在波麗露，在這樣的環境下無論是波麗露或是天馬茶房，都是士紳名流聚集以及談論新思想的最佳場所。更令人驚訝的事，這些各領域形成的公共領域多集結在大稻埕附近，形成一個完備的台人對抗日人（統治者）之區域網絡，彼此相互合作。見（圖一）。

謝理法曾評論日治時期的咖啡館—波麗露以及當時的支持者們：

「波麗都咖啡廳的藝術家和他們的支持者，向來以文化階級而自命。當西方文化經日本而輸入台灣，他們正是第一批接受到西方文化的新文化人，不管他們以怎樣的眼光來面對這個社會，他們無疑的已拋開舊文人的孤立王國，去參與實際的社會建設工作」（謝理法，1998：77）。這一段話替本章節下了一個貼切的註腳，咖啡館經由日本傳入台灣，其中的參與成員也多為掌握城市中經濟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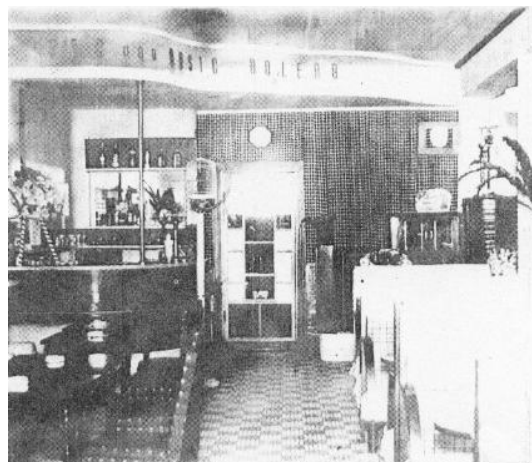
是文化資源的文化階級，由於他們多受到西式教育的影響，他們所面對的環境是台灣二度轉移統治權徬徨無依的焦慮狀態，無論他們所採取的是孤立或是開放態度，都必須以任何行動面對社會。審視各聯盟的參與成員，以及他們的回憶，台灣文藝學會的成員之一的黃得時，就提到當時的咖啡館（喫茶店）：「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坐坐，談文學，欣賞名著，聆聽名曲，那些人嗎？大多是新聞記者，和業餘作家。那時人口少，館子也少。比較常去的是明治喫茶店和森永喫茶店」（姜捷，1985：193），是當時的新聞記者與業餘作家、藝術家的聚會場所，然而咖啡館僅扮演著社交空間如此的“背景”功能嗎？至少除了一般的社交場合外，咖啡館更是文壇裡重要大事不可或缺的發生地點，如1936年郁達夫來訪時的盛況：「記得廿五年底，郁達夫先生到台灣，在報館演講中國的詩，之後一起到榮町的明治喝咖啡，郁達夫是很浪漫的人，酒量很好，大夥暢談文學事。當時能有祖國一流作家到台灣，是很令人振奮的事，到現在印象都很深」（姜捷，1985：194），還有「另一項活動是當日本有名作家來，就在咖啡館小坐，開座談會，記者包圍問東問西，有的名家會題幾筆留念，店家立刻裱褙好掛起來，賓主盡歡。很溫馨地。現在不是這樣啦！有貴賓來往往大開宴席，享用中國佳餚，以前只很淡泊的請喝咖啡」（姜捷，1985：194），上二段話雖不能證明咖啡館場所特質具有符合當時追求民族解放運動的象徵，但是它仍然符合當時文化菁英對於追求現代化的期待（無論是向祖國或是母國的看法），再加上咖啡館本身之空間特質，正適合文藝活動的展現，於是造就一個在咖啡館裡醞釀的文藝公共領域的崛起。

當時的美術與戲劇形成的文藝公共領域特徵，典型代表即是天馬茶房與波麗露。1930年正式受到日本教育培養的台籍第二代知識份子，大量回台的年代，這些大稻埕裡留日的知識份子，不但帶回從日本帶回了西方新思潮，也帶回了泡咖啡館談時事的習慣，謝里法說到：「當時在台灣的知识青年獲得新思想的來源：一是間接由日本留學生吸取歐美式的民主主義。二是透過祖國大陸求學的學生輸入三民主義及五四運動的思潮」（謝里法，1998：49），也正因為有了這些新思想的支持，對於殖民者所施加的不平等對待愈發不平。於是不管是在政治上、文學上、藝術上，台人的知識份子都期望能有更多的自主權力。舉例來說：



臺陽美術學會的成立，就是代表著這些第一批受西方思潮洗禮的年輕人對於體制的一種抗議。1934年由楊三郎、郭雪湖、廖繼春、李石樵、顏水龍、李梅樹等留學畫家歸國，成立了「台陽美術學會」，謝里法引用當時的評論家說法：「台灣美術協會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團體組織，一方面可以在藝術上發揮中華民族的特質，另一方面可以用團結的力量，抵抗日人的歧視與壓迫…」(謝里法，1998：148)，「臺陽美術協會」相對於當時日人所舉辦的「臺灣美術展覽」，無疑的是一種“反抗性”的舉動。

然而這些具有反抗當局的舉動，僅靠著區區幾位畫家並不足以成事，這個時期文藝公共領域的發展必須仰賴喜好文藝活動的咖啡館經營者的支持。首屆「台陽展」的目錄上出現波麗露的贊助廣告，並且由於波麗露老闆廖水來對於美術的喜好，「當代畫壇的美術家以及文人雅士，都是波麗露的常客；廖老闆的是藝術鑑賞的眼光也不錯，常充當畫家的贊助人與經紀人，收藏、推銷他們的畫作，並給予經濟上的奧援..⁸」(莊永明 1992)，由此可見，咖啡館的角色除了「早期每年都到這兒舉行年展，直到歷史博物館舉辦展覽，這個活動才轉移了陣地」(丘彥明，1985：175)外，更扮演著其他知識份子或是贊助者互相交流的重要場所。又如維特的老闆楊承基正是畫家楊三郎的兄長，楊三郎等大稻埕的文藝青年，經常的出入維特⁹。除了對這些文藝青年有所意義外，其最大的貢獻在於影響後來離店分別開設波麗露的廖水來和山水亭的王井泉，這二位在近代文藝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這二間店承接起支持藝術活動之店家，尤其是波麗露與山水亭同被謝理法稱為“大稻埕畫壇”。



(圖二) 日治時期的波麗露

波麗露所開設的 1928 年正在 1926 年台展開始後不久，廖水來除

⁸ 引自八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中國時報副刊。

⁹ 維特最初是經營純喫茶，但是後來為經營不善，只好改經營“酒家”。

了是一個成功的商人外，更利用其在維特任職時期的人脈關係，讓波麗露成功的成為這些大稻埕的文藝青年的據點。但是波麗露在畫壇並非僅是被動的角色，丘彥明說到：「由於廖水來對於美術的興趣，早期每年都到這兒舉行年展，直到歷史博物館舉辦展覽，這個活動才轉移了陣地」（丘彥明，1985：176）。不僅如此，在文藝批評與藝術仲介不發達的那個年代，廖水來更使得咖啡館除了具備有提供展覽的畫廊性質外，更權充起這些畫家的贊助人與經紀人：「當代畫壇的美術家以及文人雅士，都是波麗露的常客；廖老闆的是藝術鑑賞的眼光也不錯，常充當畫家的贊助人與經紀人，收藏、推銷他們的畫作，並給予經濟上的奧援..」（莊永明 1992）。美術評論家謝理法與史學家莊永明皆肯定波麗露（圖二）在台灣美術史上的地位，謝理法更將波麗露視同如對巴黎畫派影響甚大，蒙巴爾斯納的 Demo 和 Rotonde 等咖啡館。

「廖水來自從開了這家咖啡廳以後，有許多的文藝界的朋友前來捧場，除了生意興榮，自己也在文藝界成了知名人物，義不容辭的充當起畫家的贊助人來。經常拿錢出來收購畫家的作品，有時又將這些作品向自己朋友圈子推售出去，把所得的錢又向畫家購畫，接濟畫家的生活。所以當大家談起巴黎畫派和而聯想到蒙巴爾斯納的 Demo 和 Rotonde 等咖啡廳的同時，論及我們的台灣美術運動，也就無法不提到『波麗都』咖啡廳和廖老闆。」（謝理法，1998：76）

波麗露在台灣美術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開啓了美術評論與美術仲介的大門，使得台灣美術的發展更加蓬勃與獨立。邱琳婷說到謝理法之於美術評論的貢獻之一，就是其將台灣美術運動以：「畫會、沙龍、畫廊、美術館等四個公共領域區別出台灣美術近代化的四個過程」¹⁰（邱琳婷，1999：46）。謝理法認為對畫會時期的台灣美術運動最大貢獻的二個空間，即是民間裱畫店與波麗露咖啡

¹⁰ “畫會”指的是 1920 至 1930 年的早期畫會與 1950 年的現代畫會，“沙龍”指稱學院色彩濃厚的官辦美術展覽會，“畫廊”則是在經濟快速發展中所出現的現代藝術活動，“美術館”則是強調“教育”的功能性。



館，而美術運動透過裱畫店老闆與畫家和買家之間建立了新的經濟關係，但是透過裱畫店交換的畫壇經濟活動的規模並不大。

相較而言，咖啡廳以另一種比裱畫店更具公共性的空間出現：「以咖啡廳為公共領域的需求，可說是陸續歸台的留日青年所帶回來的西歐新思潮。…如此，『波麗露』和『山水亭』的存在，將公共領域內涵由裱畫店的經濟行為，轉變為贊助者與畫家互動的主要場域，而有別於過去附屬的地位」（邱琳婷，1999：46），可見這時期的咖啡館對於台灣美術運動的深刻影響，多取決於經營者本身對於藝術的喜好進而轉為贊助者的過程。同樣的現象出現在天馬茶房，店家詹天馬其女詹慧玉的回憶：「當初他開設天馬茶房，是因為他本身喜愛文藝，剛好也可以提供這些朋友一個聚會場所，所以有很多藝文人是就習慣聚在茶房這了，難得有聊的來，並且本身也支持文藝活動的店家嘛，我想是因為這個緣故。…我爸他甚至會資助一些比較潦倒的藝文人士，拿錢給他啦等等，像現在台灣畫壇某位知名的畫家，就有受過爸爸的幫助」（林宜屏，2000：166）。無論是波麗露或是天馬茶房之於台灣美術之公共領域貢獻，在於經由買畫與賣畫的經濟活動的基礎上，建立“藝術評論”的開始，提供了此領域發展的經濟基礎。咖啡館除了是愛好者或一般大眾公開談論的場所外，更是談論以美術作品為對象，進行經濟行為之公共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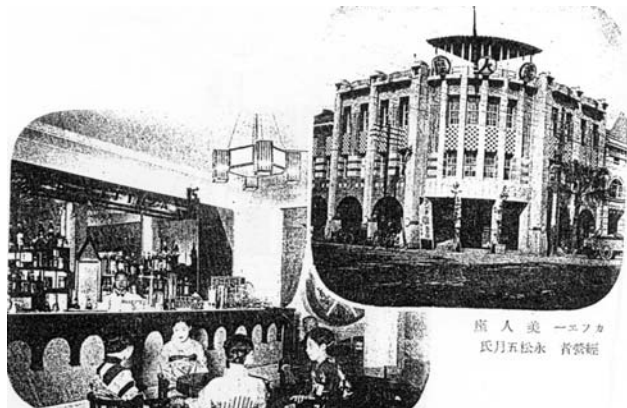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當時的訊息總是受到日本政府嚴密的掌控，台籍記者除了單方面的接受日本政府的官方新聞外，更多的時候則是流連於咖啡館裡探消息。不可否認的越多人士出入之咖啡館，自然的也是訊息的集散處，秉著有“人”出沒自然有“消息”出沒的原則，記者也是咖啡館裡的族群之一。以天馬茶房為例，陳雪慧訪周青（日治時代至光復初期的記者）時，他就說到：

那時我做一個新聞記者要騎自行車，台北到處去找新聞。後來我比較出名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我上午愛到Borelo(波麗露)去，下午到天馬茶房來。所以人家有什麼困難，發生什麼問題，變成不是我去採訪，是老百姓、群眾自己把這個消息帶來找我。那麼我根據他們提供的情況，到現場去核對、去調查，然後再來為報導。譬如說，司機工會罷

工，學生要搞學生運動，他們就通知我去採訪¹¹（陳雪慧 2000）。

在這段回憶裡，周青點出了一個重要的重點：記者除了到處找新聞外，更重要的是倚賴“線報”，在電話還不普及的時候，更突顯記者吸收消息時，固定的地點作為據點的重要性。如此這般，一般的民眾也得以在固定的地點找到記者通知採訪，更可免除記者東奔西跑如無頭蒼蠅般且碰運氣的消耗精神。又天馬茶房與波麗露位於大稻埕，一般台人要報消息也不至於到城內日人活動的明治喫茶店，自然會到自己地盤上。咖啡館因為有音樂聽、咖啡喝、又有桌椅燈光供寫字、還方便相約採訪來報消息的人士，正是完美的據點場所。另外，記者們也可以在人來人往的咖啡館裡增廣人面、探聽消息。因此在媒體之公共領域的發展上，咖啡館在此時期也扮演了相當的角色。

咖啡館在現實生活中充滿著豐富的內涵，即使同樣的空間，在不同的社會氛圍裡也有著不同的意意。咖啡館在美術界與戲劇界被視為實踐理念與討論公共議題之場所，然而在文學之領域裡，咖啡館卻是一個荒淫縱欲的聲色場所。楊雲萍在小說〈加里飯〉中描繪咖啡館



（圖三）日治時期美人座喫茶店

（喫茶店）裡顧客們取樂的情境：「他偷般的瞧那二個學生和三個公司里的用員。他們正自在地和女招待戲謔。有的握他們的粉腕，有的抱他們的細腰。他感覺著他們像懂自己的根底——學費不夠的貧青年，被人征服的劣人種一般的，在愚弄他、嘲笑他」（楊雲萍，1927/1990：49）。另一個例子是賴和的〈赴了春宴回來〉裡的一段描述：「一被邀進過咖啡館，在肉香、酒香，還有女人的柔情、

¹¹ 陳雪慧訪日治時代記者周傳枝，又名周青。



媚態的包圍中，一次、二次…心也快活啦。不是麼？吃過晚飯，總覺得失掉什麼似的，心理頭空空虛虛的，只是悶，就一直等到喝下酒，嗅嗅女給們的胭脂味，才算把空虛填平」（賴和，1935/1990：210），這篇文章是賴和在 1935 年所作，在這之前武裝的抗日運動已經可以說是失敗，賴和認為之前發生的鬥爭時代已經過去，投射在小說中，這些原本投諸於社會運動的有志之士，在面臨現實的下屈服於統治當局，於是便藉由咖啡館（圖三）的歡樂氣氛來麻醉靈魂與忘情於貌美“女給”的溫柔鄉。陳芳明認為這篇文章道盡賴和沒落之心境：「〈赴了春宴回來〉這篇小說，很明顯自我批判相當嚴重的作品。即使是虛構的文字，裡面透露的『不是敢違阿母訓，美人情重更難違』，幾乎已閃現賴和失去鬥志的實情。同樣是彰化作家的陳虛谷，曾贈詩給賴和，毫不掩飾地留下了這樣的詩句：『鄉里皆稱品學優，少年也不解風流；哪知心境年來變，每愛偷閒上酒樓。』從一個品學兼優的知識青年，轉化成晚年的在酒樓中偷閒，不正是他生命邁向幻滅的準確寫照嗎？」（陳芳明，1998：63）。王詩琅之〈沒落〉與賴和之〈赴了春宴回來〉文章中，所描繪出的咖啡館是墮落的無盡深淵、是左翼知識份子絕望轉化為頹廢無用之人的地點。再者，在左翼知識份子的眼中“咖啡館”竟又也成為階級鬥爭展現之場域，楊守愚在其小說〈元宵〉裡，小說的主角因為受到幾個資產階級的譏笑，而激起農工兄弟被富人階級剝削想法時，最後仍氣憤的說出：「媽的！索性就到咖啡店樂一樂吧！」（楊守愚，1931/1990：138），這一句話，可見當時的咖啡館（圖四）除了是文化階級表達反抗意識的場所外，也是一般人逃避現實療傷的洞穴。



（圖四）日治時期 喫茶店

無論是認定咖啡館是反抗意識的集會場所，或是玩樂摩登之社交場所，皆取決於文化階級所站在的發聲位置而定，以美術或戲劇活動的運動核心是向西

方現代化看齊而取經於日本，其所關心的問題是面對殖民社會下與日人文化階級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所以爭取作品發聲的位置遠比站在何種階級傾向來得重要，所以他們不排斥咖啡館在當時所呈現的文化象徵。而文學領域的文人們在新文學的洗禮下，將戰鬥位置由反帝國主義落實至反階級社會結構層次上。楊守愚、賴和、楊雲萍（這些被稱具有左翼批判精神之作家），即便是立場不明確的王詩琅。在他們的作品之中，想當然爾的將咖啡館視為虛榮與墮落的象徵，有趣的是，在這些作品的結論裡，知識份子仍舊躲進咖啡館裡逃避他們在政治上失意的景況。

二、光復初期（1949-1960）文學公共領域於文藝公共領域的突起

光復初期的社會，普遍面臨著因大陸戰後移民所產生的空前的惡性通貨膨脹使得經濟狀況異常混亂。在社會經濟環境的匱乏下，屬於昂貴消費的咖啡館難以生存，只有少數幾家隨著國民政府移民來台的咖啡館（如明星、美而廉、中國之友社）相對的擁有較多的資源得以生存。再加上二二八事變就是爆發在大稻埕的天馬茶房前面，事件之後天馬茶房只好關門大吉。回顧二二八事件的暴動，為何恰恰好發生在天馬茶房前面呢？難道天馬茶房只是一個偶然的地點而已，背後有沒有特定的原因呢？電影《天馬茶房》的編劇葉金勝為我們解答了疑惑：「那時候菸從香港跟上海的船走私進來，在淡水下貨再用人力運到天馬茶房走廊去拆裝。…天馬茶房當時可以說是走私菸的批發市場，尤其是黃昏的時候…為什麼選擇在天馬茶房的走廊？因為它是大稻埕少數在黃昏時候就點燈的地方，大家算錢、批貨都很方便…」（林宜屏，2000：163）。除了葉金勝回憶關於查緝私煙而到天馬茶房的（功能性）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咖啡館除了是一個人來人往的公共空



（圖五）電影天馬茶房一場景

間。再加上二二八事變就是爆發在大稻埕的天馬茶房前面，事件之後天馬茶房只好關門大吉。回顧二二八事件的暴動，為何恰恰好發生在天馬茶房前面呢？難道天馬茶房只是一個偶然的地點而已，背後有沒有特定的原因呢？電影《天馬茶房》的編劇葉金勝為我們解答了疑惑：「那時候菸從香港跟上海的船走私進來，在淡水下貨再用人力運到天馬茶房走廊去拆裝。…天馬茶房當時可以說是走私菸的批發市場，尤其是黃昏的時候…為什麼選擇在天馬茶房的走廊？因為它是大稻埕少數在黃昏時候就點燈的地方，大家算錢、批貨都很方便…」（林宜屏，2000：163）。除了葉金勝回憶關於查緝私煙而到天馬茶房的（功能性）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咖啡館除了是一個人來人往的公共空



間外，出入的人士就是當時代能夠接受新觀念的有識之士們，他們在咖啡館（圖五）裡寫著、聽著、排演著同樣不被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接受的台灣民歌：望春風、雨夜花、丟丟銅、六月田水等歌曲與閩雞、高砂館、地熱等新劇，這些舉動無疑的也是對統治階級的進行一種“地下之聲”的反抗。咖啡館裡客層的高區隔性—文化階級的領域範圍，正好提供了一個秘密結社的安全性，在此安全的領域裡不受統治當局的控制。統治階層當然也知道咖啡館裡所暗藏著的不利於“統治權力”的危險。

在一位李君章先生的訪談紀錄裡，意外發現他在戰後於彰化也開了一家天馬咖啡室¹²，透過他的描述，我們可以約略知道當時戰後咖啡館難以生存的原因：「當時有一批大陸來的人不時來店裡，他們一來就閒位置窄，隨意搬挪桌椅，恣意泡茶聊天。我原本經營咖啡室是很有高的文化理想，實在無法忍受這些人的胡鬧，有一次我對帶頭的人說：『先生，我們很難招待你們』，結果那人就用槍猛擊我的腰脅，並罵我是匪徒、非國民，此後不管刮風下雨，必派人來店監視，使得客人紛紛抱怨，但我也無可奈何。如此一連五年，直到有一次，一年七天不見這些人蹤影，我立即搬家北上板橋。」（魏素惠 1996）可見當時的統治階級相當在意反抗份子躲在咖啡館裡的結社行為，所以往往假借任何的名義就近監視。這種監視行為當然不利於咖啡館的生意，也正是許多咖啡館難以生存之原因。但是，隨著經濟狀況的回穩與復甦，統治階級的權力漸漸穩固後，社會也相對的逐漸開放，許多的咖啡館才又蓬勃發展起來。

1950 年後當時的文學體制在社會重大變革下，產生嚴重的斷裂。在日治時代裡頗富盛名的作家們，再度的經歷一次的“失語”，不能以自己流利慣用的日文寫作，重新學習國語的漢文寫作，作家對於不慣用的語言與文字難有表現下，城市中另一批的文化階級隨之崛起並取而代之。這批取而代之的新文化階級，分為二大類。子敏曾說到：「文人有二型：喜愛古典文學的，傾向上館子喝

¹² 引自〈平埔認同的建構—李君章先生訪談記錄〉魏素惠記錄，1996/8/18。「結婚後我和內人在彰化火車站前開了一家咖啡室，因為師傅來自台北的天馬茶房，所以叫天馬咖啡室」（魏素惠 1996）。

二杯；探索西洋文學的，對浪漫的咖啡館有好感」（隱地，1992：218-219），正點明這個時期的二種傾向。一是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軍民們，當時正是軍中文藝的全盛期，也正是自戒嚴後提倡的“戰爭文藝”，這一類文章在統治階級的有心的倡導下，以建構國族認同與反共救國為穩固統治政權的手段。而這一類軍人作家們的大本營正是國軍文藝活動中心，創世紀詩刊的張默和彭邦楨有很長時間便是在此編排。

另一則是受到西方知識體系教育訓練的戰後第二代的新知識份子，它們受到西方現代主義的啓蒙，不願意文學淪為鞏固國民政府統治政權的打手，而全面傾向西方知識體系與文學傳統，追求以文學的力量引發國人對於現代化的思考。張誦聖認為：「台灣四九年以後文學體制受大環境影響有一些明顯印記：如早期當代中國/台灣文學教學在教育體制裡突兀地缺席；以西方現代主義為範本的菁英文學觀有效地衝激了新文學以來的國族建構文學論述（或說造成了新的組合）成為主要文學批評標準；外文學術圈在引進文學思潮、批評理論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長久以來成為當代文學創作、評論及學術研究的主要人才供應庫等等¹³」（張誦聖，2000：28）。這說明了政治上的大變動，使原來用日文寫作的文人們在失語的狀況下，多半選擇封筆或是意志消沉，於是源自於三〇年代的文學傳統被這二股新的文學體制取代。劉紀惠在研究日據時期的重要新詩作家林亨泰說道當時的作家的心境：「作家當時所面對的不僅是政治歸屬的問題，或者如何由日文跨越到中文的創作語言問題」林亨泰甚至對於戒嚴以來所提倡的戰鬥文學，大感的失望與無奈。

1. 咖啡館之專門化傾向與成為文學生產鍊的一環

文學體制的轉變，直接的影響著而咖啡館的角色之轉變，隨著文學出版事業的專業化，咖啡館因其空間形式與所能提供的功能，成為文學生產鍊的一環，並且以趨向專門化傾向，也就是不同屬性分類的咖啡館之出現。觀察光復後時

¹³ 引自周英雄、劉紀蕙編（2000），《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



期出現的咖啡館，大多位於以衡陽街與重慶南路中心的區域內，原因與當時衡陽路與重慶南路俱為書店與出版社林立的街有關，「當年的衡陽路和重慶南路一段，書店不少。『田園』的存在，很容易引起逛書店的文人們的注意¹⁴」（子敏 1992），「在地緣上，『明星』接近重慶南路一段的書店街，也接近火車站，逛書店的文友想找個地方坐下來談談，臺北的文友跟北上的南部文友約會，『明星』是一個方便的地點¹⁵」，子敏對於這幾個咖啡館的描述正可以說明，光復後的咖啡館基本上是屬於“文藝的咖啡館”特性，因此坐落於書店街或是藝文活動頻繁的區域裡以佔地利之便，也更為理所當然。然而僅將咖啡店開設在這個文藝區裡並不足夠，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種“文學”職業的生態圈：「中山堂廣場沒有像巴黎那樣的露天咖啡座，『朝風』至少是在廣場的邊緣。報館編輯跟作家、詩人、交誼，常常約好在『朝風』見面。『拉稿』，甚至是不得已的『退稿』，都在那裏『低聲』進行¹⁶」（子敏 1992）。當時咖啡館在整個生態圈裡的位置結合相關業種，形成一種“文學鏈”的一環，出版社的工作者在咖啡館裡約見作者、排版討論、甚至送印至鄰近印刷場印刷、乃至到咖啡館裡發表新書、辦展覽，都可以在這個生態圈的區域裡完成。

這時期咖啡館隨著社會各領域趨於專門化的影響，活躍於咖啡館裡的美術與戲劇圈，則轉變為某一領域（如文學、音樂、美術）聚集產生社群的場所。於是以“音樂”為特色者—波麗露、田園、朝風、野人等咖啡館；以“文學”為特色者—明星咖啡館、文藝沙龍、作家咖啡屋；以“藝術”為特色者—波麗露、明星、天琴廳。而波麗露、田園、朝風、野人這幾家咖啡館都是因為擁有在當時堪稱先進的音響設備聞名，商禽說到朝風不是為了咖啡，而是為了“觀音樂”，雖然當時的唱機可能老舊：「朝風的硬膠唱片（十吋），每面約三—四分鐘，往往播一首交響曲就要一小箱唱片（六至十張）…唱片、唱機與擴大器都是屬單頻道，但那隻大喇叭很不錯，是英國的羅拉，十八吋..原裝的木質音

¹⁴ 出自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中國時報副刊〈約會在朝風〉。

¹⁵ 同上。

¹⁶ 同上。

箱老舊落伍……¹⁷」(江述凡 1997)，但仍為一般喜好古典樂的愛好者喜愛的去處，江述凡也說：「當時能有朝風可聽古典音樂，已經是一大享受啊！」指揮家陳秋盛也在台北的回憶裡說到：「外國原版唱片價格之貴，也絕非一般學生負擔的起。每天聽音樂的我，只能靠中廣的空中樂府……等填補我的願望。當時台北有二、三家咖啡館，擁有相當數量的原版唱片，約一、二位同好，點一杯咖啡，可以聽、點一整天的音樂，這樣的“享受”對於當時的我是非常滋養的事情」(陳秋盛，1997：57)。正因為這些喜好音樂之士總是會一傳十的告知同好，哪裡有“好聽”的音樂，所以朝風咖啡館才能成為音樂領域的聖地。雖然也有像雷驤這種誤打誤撞的顧客進入田園咖啡屋，但是由於田園的底下是為代理古典音樂的唱片行，也容易成為此領域中的重要場所。雷驤說起進入田園的一段因緣：

「我第一次偶然踏進新公園衡陽街的某一段，有一家底下代理原版古典音樂唱片，樓上是音響極好，把音樂飽和的充滿室內的咖啡室，那時我還是不滿十八歲的藝術學生，自此從這家變換各種曲目的店裡，初識了法蘭克入布拉姆斯、德布西、蕭斯塔考維奇這些人的作品」(雷驤，1996：57)，雷驤甚至認為：「若干年後，我將古典音樂賞析的訓練，一度作為自己在電台導播的職業時，不免感謝田園咖啡店的啟蒙」(雷驤，1996：60)。

以文學為主題的咖啡館，除了有計劃的文藝沙龍與作家咖啡屋外，明星與朝風可謂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範例，波麗露的文藝青年在光復初期也由大稻埕轉至（以前的城內區）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館：「光復後台陽、雲青畫會的一群畫家李梅樹、楊三郎、廖繼春、顏水龍、顏雲連等就常到明星聚會，並自動取自己的作品佈置明星的牆壁，至今明星牆上的畫仍因循著這個不成文的舊規，一方面掛著給自己欣賞，一方面也供別人欣賞」(丘彥明，1985：188)。由於咖啡店老闆的允許，使得咖啡館一開始就以親近“藝術”之勢，打入文藝圈中。然

¹⁷ 引自中央日報 1997 年 3 月 17 日。



而明星的盛期以及日後留名於文學界之原因，不得不說拜《現代文學》、《創世紀》、《文學季刊》...等文學刊物，將明星咖啡館視為編輯室所賜：「黃春明、何欣、姚一葦，及現代文學開創戰將，都在這裡閃過身影。..甚至《創世紀》在那裡校稿，《文學季刊》在那裡聚會」（姜捷，1985：196）。雷驤回憶第一次到明星咖啡館，就是為了會見當時在明星咖啡館主編《文學季刊》的主編們，且在錄用後經常性的在此和其他文友會面，「我首次踏上武昌街明星咖啡店，在二樓中間那張灰色大理石圓桌面前，會見了主編尉天總、陳映頁、王禎和、黃春明、施叔青諸人，因為我的一篇寫犬的復仇小說—原本按例寄給七等生讀的，他將之寄給《文季》。總之，在那樣一種同仁雜誌杜「求才若渴」的歡迎下，此後的兩年間，我固定的寄稿發表，也即經常踏上這處幾同《文季》編輯部的咖啡店二樓」（雷驤，1996：62）。子敏和曾任現代文學編輯的陳若曦與陳映真都說到明星咖啡館成為文學圈中社交場所之因¹⁸。

這一類型的結社的方式，相對起來並不若日治時代對抗殖民時期皇民化運動跨領域（文學、戲劇、美術）之結合來得明顯。這些咖啡館裡的人們，本來就是訴求於對於特殊領域之喜好。所以這些咖啡館成為某個畫會、文會之大本營。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這些咖啡館本身所在的地區，位於中山堂旁的朝風、衡陽路上的田園、武昌街上的明星咖啡館，都算是位於城市中文藝區的附近，而佔了地利之便。附近不但有中山堂的廣場，又有文星書局以及重慶南路上的書店區，更有許多的印刷廠在附近，方便這些文人在此商討編務。曾任文季編輯之一的陳映真也說，當時的明星可以說是《文學季刊》的辦公室、編輯部和會客室。這樣一來，另一種以“刊物”、或是“理念”為導向的組織結社關係便孕育而生。「六〇年代的文學活動多是同仁式的，一群文友、一本雜誌，大家就這樣樂此不疲的作了下去。當時我們寫作，好像也沒有什麼崇高的使命

¹⁸在地緣上，『明星』接近重慶南路一段的書店街，也接近火車站，逛書店的文友想找個地方坐下來談談，臺北的文友跟北上的南部文友約會，『明星』是一個方便的地點。...年輕的文人喜歡在這裏交換寫作思想，商量怎樣編印刊物，或者，會見只交換交過一張照片的『筆友』。（隱地，1992：218-219）

感，沒有叫出驚人的口號……。寫現代詩、現代小說，六〇年代初，還在拓荒階段，一般人眼中，總有點行徑怪異，難以理解。寫出來的東西，多傳閱於同仁之間，朋友們一二句好話，就算是莫大鼓勵」（白先勇，1984：64），所以在這些“以文傳文”的現代文學的發展，以同仁之間的傳閱擴大讀者群與作家群，在十年間大量積累現代文學的作品。

1950 年—1960 年正是台灣文學的另一個顛峰時期。《文星雜誌》《現代文學》《藍星季刊》《文學季刊》等文學雜誌的創刊皆與咖啡館有著緊密的關係。根據雷驤的訪談中，說明明星的與文學季刊的關係密切：

明星很重要，因為他二樓跟三樓，也是那時候很多文化人聚集的地方，我剛說過，等於是文學季刊的編輯部，那裡有一張白跟灰的的大理石圓桌面，是我們經常盤據的地方，這個比較大，可以圍四五個人…那時候出現的文友，主編當然是尉天聰，有陳映真，還有一個畫家吳耀忠（陳映真夜行貨車的封面就是他畫的），跟我們那時候基調是一樣的，…。王禎和、黃春明、七等生、施叔青、陳耀琦是學電影的，那時候有兩個重要的雜誌彼此有跨界，叫『劇場』，陳耀祺也在劇場寫一些翻譯，也在文學季刊寫一些創作，還有劉大任…。¹⁹

可以想像的是這些文藝之士在明星咖啡館裡商討著這期《現代文學》裡要有哪些內容？有哪些人的作品值得大家討論？這一類的問題。尉天聰和白先勇、陳映真²⁰、陳若曦等人分別在 1960 年、1966 年創辦了《現代文學》、《文學季刊》，這些雜誌都是引領著台灣現代文學向前邁進的重要指標。本研究提出這些文學刊物的歷史的目的在於，這些人的回憶裡，其實或多或少的都曾經提及

¹⁹ 引自筆者雷驤訪談紀錄，2001/7/2。

²⁰ 陳映真也曾在文章中回憶明星咖啡館：《筆匯》的同仁都會在台北武昌街的『明星』西點咖啡『作班』，等著校稿、送稿和聯繫。…每年發表的三、四篇小說，也都在公餘和文友在『明星』咖啡泡著…（陳映真 1997：68）。



當時他們所在的咖啡館，並追憶當時的鼎盛文風。下表（表一）將當時的著名的刊物與號稱為編輯室的咖啡館作一對照。

（表一）刊物與咖啡館對照分析表

年代	刊物名	咖啡館
1950~	創世紀	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明星
1957	文星雜誌	田園
1959	筆匯	明星
1960	現代文學	明星
1961	藍星季刊	明星
1964	台灣文藝 藍星	田園
1966	文學季刊	明星
1967	純文學	
1968	詩隊伍 幼獅文藝 笠	作家咖啡屋 文藝沙龍 天琴廳
1965	劇場	明星

（本研究整理）

從表二可以發現 1950 年至 1970 年間，幾乎每隔二—三年就會有一本新的刊物發刊，可以說是文學活動最為活絡的時代，儘管經費不豐，許多的刊物進行一二年後沒有了經費就暫停發刊，但是很快的籌足了經費又重新組織開張。是什麼原因使它們前仆後繼呢？當時的文學環境是一個受高壓控制的禁忌年代，一方面是反共懷鄉文學當道，另一方面則是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整個大環境一片崇洋的風氣，再加上外文系的具體訓練，使得一般人使用英文的能力大增。

正因為這種原因使然，這些刊物的領導者基於本身的訓練以及對於現代主義的醉心，使它們的作品大幅加強了和西洋現代文學的接軌。但當時的社會狀況卻有落差，受西式教育的年輕人：「充滿著求知慾的知識青年卻處在一個被圍堵、被切割、被破裂、被過濾、多層次的語言環境裡…²¹」（江寶釵，1998：123），在這樣的社會氛圍裡，這些知識青年除了倚靠書寫抒發苦悶心情外，更需要一個集眾人力量發聲的出口，最為有利的武器正是“辦刊物”。“刊物”使得創作有舞台可發表，使得理念得以伸張，使得影響的層面擴大，更重要的是能獲得志同道合的盟友。

正因為咖啡館裡的創作風氣興盛，咖啡館的另一個“教育”的功能也隨之而來。雷驤、喬禽、子敏、陳若曦都曾說到朝風與田園帶給他們的影響，如：雷驤回憶裡田園的音樂啓蒙：「由於彼此專精的程度有別，不通流通資訊是很熱烈的，譬如有新的唱片進來，或者誰弄到一本管絃樂的總譜，都會在那裡傳遞。並非音樂科班生的我，因為環境的關係，後來也能在聽大曲子的時候略讀總譜跟隨的程度」（雷驤，1996：60），雷驤所指的“環境”，正是因為朝風裡出入的人士皆是音樂的同好甚至是專精者，他們與咖啡館中音樂所共構的教育環境，使得非科班生的雷驤，也可以經由其他客人在知識上的傳授，在音樂方面有所啓蒙，日後甚至還可以藉此對於古典音樂的了解，成為廣播電台職業與音樂雜誌評析的撰稿員。而咖啡館對美術界的教育功能就更不在話下，波麗露、天馬茶房、明星咖啡館裡多次贊助的展覽，以及牆上所掛滿著畫家的作品，就足以潛移默化時常出入其中的文人們與一般大眾。

光復後美術界最有名的“咖啡館裡的傳道士”——李仲生，抗戰前曾留學日本，師從巴黎派日本名畫家藤田嗣治，對台灣現代藝術推動貢獻良多，尤其是許多現在的名畫家都是他的學生，他可以說是藝術家的老師。除了創“私人授課”的開始外，他最爲人所稱讚的是其特殊的美術教育以及對於現代美術之評論。他的美術教育就是：「以精神傳精神，是激發創造力，是讓每個人有不同的個性。有一回他在咖啡廳與記者們聊天說到：『像我手中的這杯咖啡，有的人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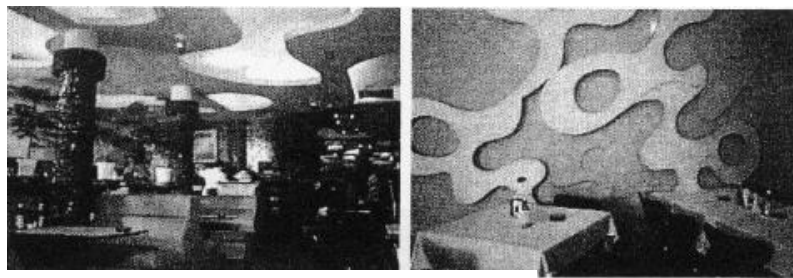
²¹ 引自周英雄、劉紀蕙編（2000），《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



喝黑咖啡，有的人加一點糖，有的人愛加很多糖；有的人加一點奶精，有的人加很多的奶精；為什麼這樣？因為你要喝過很多次咖啡，才找出你自己喜歡的味道，沒有人的舌頭能替代你，甘苦要自己嚐才得到結論。像大家都覺得煮的咖啡好，也有人偏偏喜歡沖咖啡粉，你不能說他是錯的，只是他口味不同而已，藝術不就是與喝咖啡的道理一樣？」²²（曾長生，1999：80）。他喜歡在假日帶著學生泡咖啡館裡議論現代藝術，引文所述“藝術就像喝咖啡的道理”的話以及他在咖啡館裡教導學生的照片，皆可闡釋他被稱作咖啡館裡的傳道士的由來。而這習慣當然和他早年留日師承巴黎派的名師有關，因為現代藝術的日本巴黎畫派之於咖啡館，就正如巴黎的印象派與咖啡館的密切關係。

2. 咖啡館成為空間專業者的實驗場

余崇齡先生在其論文《光復後台灣室內設計變遷之初探－以外來因素為主（1950-1980 年代）》中，大膽論述光復後的室內設計幾乎等同於“咖啡館之室內設計”，甚至將咖啡館的室內設計視為站在領受當時代最先進室內設計風格的浪頭。他引用室內設計界大老周重彥於光復後對波麗露咖啡館（圖六）的改裝為例：「波麗露這個案子裡，設計者把杯蓋掛在牆上、把鵝卵石貼在柱子上、藤椅配上萊特的椅子、畢卡索立體派時期的線條，這種傾向是蠻多元化的，當時什麼可以找到的材料，統統把它



（圖六）光復後波麗露改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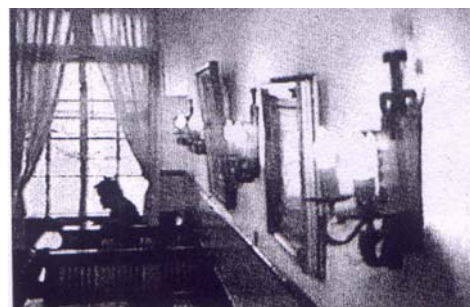
用上去，也可以說，當時美術上有什麼訊息，就可以說是當時的一個特色」（余

²² 原文引自林清玄〈領航的燈塔－李仲生〉《時報雜誌》1984.8.1

崇齡，1994：28），當時的設計者如顏雲連是受美術教育而非正式的設計教育，也受到當時流行的抽象畫影響，將室內空間的造形設計趨向為有機的流線造型，以感性、本能、重通俗效果等浪漫無章法的設計方式，都有別於後來的現代主義的設計觀。除此之外，明星咖啡館的業主，身兼經營者與設計者，開幕當時甚至歡迎畫家們到明星咖啡館（圖七）裡共襄盛舉：「台陽、雲青畫會的李梅樹、楊三郎、廖繼春、顏水龍、顏雲連等就常到明星聚會，並自動取自己的作品佈置明星的牆壁，至今明星牆上的畫仍因循著這個不成文的舊規，一方面掛著給自己欣賞，一方面也供別人欣賞」（丘彥明，1985：188）。所以在咖啡館裡，除了作家們在咖啡桌上爬格子創作外，連整體室內空間的創作都是藝術創作的一部份無法脫離。

三、經濟發展時期（1960-1970's）咖啡館文藝公共領域之轉化

六〇年代末期，越戰的戰火未休，美國反戰的聲音越益激烈，台灣的知識青年也在台北咖啡館裡討論著世界上所發生的大事：「六〇年代的國際大事是越南戰爭，台灣是美軍渡假地之一，美式文化在台灣流行…咖啡廳也是這個時期的產物，..最早揚名的是衡陽路上的『田園』，坐落文星雜誌的對面，以播放古典音樂著名，大學生和知識份子最愛光顧，也在這裡討論存在主義，品評美國出兵越南是非等等。」雖然陳若曦認為：「六〇年代中西文化激盪和互容的時代，那時期的台北兼容並收，正蓄勢待發要大展鴻圖，特別令人懷念不已」（陳若曦，1997：31）。但是也有相左的意見，如後來發起的鄉土論戰運動，作家們反省著一味向西方知識取經的方向是否適用於在本土，並希望喚起大眾對於自身鄉土的熱情。王德威認為從現代文學過渡至鄉土文



（圖七）明星咖啡館一景



學論戰裡，雖然有各派之爭，對於文學之風格乃是有志一同²³。

李昂比較了六〇代與七〇年代知識份子在咖啡館中的不同經驗。「我們不會像六〇年代的知識份子為『存在』課題辯論聲嘶力竭，要為虛無而自殺，這些問題已經過辯證確認無效並尋不到出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能像西方的青年，乾脆徹底的說，那我們就依賴迷幻藥吧！於是我們只有在台北市街的咖啡館坐下來，淡淡的說，那我們就過活吧！」（李昂，1995：47）。當時的知識份子多是追求著美國文化的腳步，去美國新聞處聽演講、在意是否能夠擠身進入某個社交圈、說話時夾雜著國語與英文，高大鵬先生就描述了這個年代裡的城市氛圍：

「…我們是這一種文化氛圍之中長大的一新舊交替、城鄉嬗遞、中西混合、真幻交織，夢與現實很難劃出界限..」（高大鵬，1992：205）

於是，當時的知識青年將其對於未來的茫然與政治上的無奈投諸於咖啡館的清談中，感嘆：「我們一群朋友，只一天天工作完後，課餘由一個咖啡館坐到另一個咖啡館，永遠只是無盡的清談」（李昂，1995：50），似乎在現代主義與鄉土論戰的時刻裡，咖啡館被視為蒼白知識份子“清談”的逃避之地，而不是如鄉土作家能夠拾起武器對抗外來者，回歸人民與土地來得義正辭嚴。

在文學體制轉向於回歸鄉土與民族認同的鄉土文學之際，文學界在咖啡館的文藝公共領域，在 1970 年代末期便隱約預告著轉向其他媒體空間（如鄉土文學之論戰即是在報章上之副刊掀起之狂潮）之可能趨勢。不過，作家咖啡屋和文藝沙龍、天琴廳仍維持著這個文藝公共領域的傳統，演講及各類講座活動仍

²³ 王德威認為「五〇年代末期以來，現代派作者為單調的創作環境另闢蹊徑，使台灣文學陡然更新。但到了七〇年代，現代主義已與抄襲西學、自我陷溺以及追求形式等貶詞相互看齊。以階級論出發的陳映真、王拓，以本土論是尚的葉石濤，甚至打著中華文化復興的官方論著，都對現代主義怒目相向。而征服『現代』的良方，端在『寫實』。寫實意味著以藝術反映人生，以人性深度凌駕虛浮形式，以鄉土及民族大義召喚個人回歸。」（王德威，1998：165-166）

在咖啡館裡舉行。胡品清經常受邀至咖啡館裡演講，因而在其許多小品散文都曾提到那些在咖啡館裡談論中國現代詩的時刻：「那夜，燈光淡淡，詩意濃濃，那就是一個超凡脫俗的夜，作家咖啡屋的二樓有六位中國現代詩人和八位異國教授浸浴在詩的氣氛中。按照伊壁魯斯的說法，生命只是一連串的俄頃。就是在那個屬於詩的俄頃，我被邀請把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新詩演變，作一個有系統的介紹，在淡淡的燈光下」（胡品清，1978：94）。除了作家咖啡屋的詩展、詩歌朗誦、新詩專題座談外，天琴廳文藝沙龍也同樣有相同的文藝活動。「亞弦在幼師文藝任主編，常選天琴廳舉行文藝座談會，陳世驤教授便曾應亞弦之邀在這裡做過座談，還吹奏過笛子」（丘彥明，1985：185）。

這一時期傾向支持文藝活動的店家之咖啡館，不若日本殖民末期的咖啡館經營者僅僅是贊助文藝活動的被動角色而已，而是文人們為了對抗文藝咖啡館日益凋零而轉為“金”字頭的黑咖啡館，以及無法認同純美式文化的野人咖啡屋裡吵雜的西洋流行音樂和怪異的頹廢風。當時的作家等文藝之士，便計劃集資開設屬於“文藝圈”的地盤。1967-1970年間的幾家咖啡館：文藝沙龍、作家咖啡屋、天琴廳，這三家咖啡館就是這一類型的咖啡館，因其經營者與投資者本身就是作家或是文藝圈的成員，更容易吸引文人墨客的到訪，尤其是“作家咖啡屋”是一個有計劃的發聲行動，除了經常性的舉辦文學和詩的活動外，更舉辦朗誦詩與文學的座談。這一類型的咖啡館典型的功能就像晏琪回憶作家咖啡屋一般：「作家咖啡屋曾經有過一項永遠無法取代的功能：當時它是藝文各界聚集約晤、互通音問的樞紐。咖啡屋的投資夥伴，固然來自藝文各界，接觸面自然廣被人際。圈內的人士來到咖啡屋，你或多或少總可以見到熟人，不會落單。因此，無論詩人、與詩人間，或文學、藝術、音樂各界交互間，都經由咖啡屋的服務，得到聯繫與溝通，甚且收到一些無心插柳的善果。」（晏琪，1985：192）。

但是這一類型之咖啡館的生命並不久長，在文人多半經營不善之下，咖啡館總是在競爭之下被市場淘汰，並且由於咖啡館被日漸興盛的蜜蜂咖啡與純喫茶之黑咖啡館取代，文人也不在咖啡館裡寫作了，姜婕在文章中感嘆：「一杯咖啡的價值，往往建立在打得小蜜蜂的分數上，更多的事情和生意在咖啡館裡進



行，更多的腳步門外徘徊」(姜婕 1985：197)，咖啡館成為文人在城市裡失落的文學夢，「咖啡館呢曾經是這個城市的最沉、最黑、最香的夢嗎？」(姜婕 1985：197)難怪姜婕說出了所有當時的文人的心聲“我們需要咖啡館”！在文學體制與社會環境之轉變下，使得這時期的文藝公共領域逐漸趨於轉向副刊、雜誌等媒體空間上延續。另一波文人在咖啡館寫作的高潮，則是要到 1980 年代末期，子敏感嘆咖啡館雖然仍是文人寫作的生產場所，卻已經失去在咖啡館裡熱切討論議題與親密結社的作用。

伍、結論：文學（作家）世界裡的咖啡館想像—創作與夢想之象徵

從上我們歸納出咖啡館在次三時期之（文藝）公共領域中所扮演之角色。從 1930-1970 年代談起，若是粗造將文學體制二元化的對比，此三個時期的文學體制大致上可以分為（1）台灣文學挑戰皇民文學，指涉了第二代殖民知識份子，“透過日本文壇與日文閱讀來接受西方藝術概念的啓蒙”，所意識自身被統治且殖民的民族意識與國族認同問題（張誦聖，2000：35）。（2）現代文學挑戰戰後的戰鬥文學（反共救國文學），此為接受西方知識體系的戰後第二代知識份子不願屈服於選擇性的中國新文學傳統，致力追求文學與社會的現代化（西化）。（3）鄉土（寫實）文學挑戰現代（現代主義）文學，作家們追求回歸原鄉的風潮，致力追求描述真實的土地與人民的原貌，而抨擊現代主義抄襲西學、自我陷溺以及僅追求形式的“病態現代主義”（王德威，1998：165）。然而這個三個文學體制乍看下的激烈衝突，其實本質上卻是同出一徹。張誦聖認為在大部分的分析方文學體制裡，普遍皆面臨“被動性的現代性”的驅使，並且外來影響的新文學概念往往與傳統（舊）文學，不斷競爭高層文化的地位。「由西方輸入的、或因外來影響產生的現代概念，對通行的文學論述及當代文學創作往往具有高度壟斷性，而輸入的文學概念逐漸成為直接或是間接形塑高層文化的主要因素。」皇民文學、戰鬥文學、現代文學皆為外來的現代化概念，即使是鄉土文學也如王德威一針見血的批評：「如果我們把現代文學看做是六〇年代作家思考、定義台灣現代性的嘗試；鄉土文學則不妨視為七〇年代另一階段表徵。現

代的定義從來是莫衷一是，但基調皆出自對時間斷裂的危機感，對主體失落的曖昧鄉愁。」總而言之，這些文學體制的論戰實質上同在追求文學現代化與現在性，然而咖啡館在這段歷史的角色絕非偶然有之。西方與日本移植來台的咖啡館，因其在具有形塑文藝公共領域的空間情境下，成為文人們在各階級追求現代化（西化）的過程的相對應空間。咖啡館與西洋文學掛上等號並與浪漫齊名，正是自波麗露以來，延伸至現在的咖啡館最為重要的源頭。

在 1970 年電視尚未普遍進入一般家庭生活中之前，台北咖啡館和其他具有公共領域特質的公共空間一樣，分擔了部分城市公眾的公共活動的重要場所。廖炳惠認為 1920 年推出的第一份中文報紙《新民報》反映了：「台灣才真正從現代經濟殖民方式邁向另一個時期，也就是抗爭形的公共文化」（廖炳惠，2001：86）。他認為在 1895 年-1920 年間，台灣的地方士紳或是地主配合下，許多文化菁英得以有機會受到栽培，自第一批留學於日本接受西方民族自覺啓蒙的留學生歸國開始，台灣的文化菁英得以利用知識與組織的方式進行抗爭型之公共文化。尤其在 1930 年之後：「公共文化便產生一種現代主義的非政治面向，或是理想的社會傾向，這些傾向展現在文學創作走向社會主義的寫實，以及繪畫開始邁向西洋現代美術的實驗時，便可以看出當時台灣公共文化的無力感…」（廖炳惠，2001：89）。「咖啡館」可以說是在這個時期的盛產，不管是在非政治、理想性或是藝術創作的面象上，都提供了完美符合的空間條件。在這個時期的文本中所呈現的咖啡館，是奢華的消費象徵，是社會寫實主義下階級鬥爭的場域，同時在現實的咖啡館中，也是各類作家協會、藝術團體、美術活動的重要發生現場。咖啡館同時成為文化階級在面對統治階級時，闡述不公平對待的社會階層鬥爭論述場域，咖啡館也是城市中文化階級藉由不同於無產階級或是中低下階層的藝術活動，以區辨且彰顯自身階級的發聲位置。

日治時期的喫茶店的另一個普遍的印象：賴和的短篇小說〈赴了春宴回來〉：「『咖啡館真是個好去處，只要有錢—』…一被邀進咖啡館，在肉香、酒香，還有女人的柔情、媚態的包圍中，一次二次…心也快活啦。…²⁴」（賴和，

²⁴ 原文發表於《東亞新報》1935 年 12 月 10 日。



1935/1990：209-210)。(在楊雲萍的〈加里飯〉、楊守愚〈元宵〉也有類似的敘述)，楊雲萍和楊守愚的二篇文章更利用咖啡館作為風流的有錢階級和失業者、一般學生階級產生貧富意識衝突的場所。以上的三篇文章皆呈現了咖啡館是富有階級的玩樂場所，是與美貌女侍談笑、玩樂的社交空間，一般勞動階級不曾跨足的領域。

相較日本殖民時期之文人在作品中所呈現“咖啡廳為萬惡深淵”之定位，光復初期的咖啡館正式與文人連結在一起，甚至被視為“最後救贖之地”。發生這個戲劇性的轉變，和文化的殖民現象以及外來/傳統知識體系之間競爭有密切相關。林懷民更在《蟬》裡借劇中的角色之口，說出咖啡館為何讓當時代無數大學生或是新知識份子認同的心靈安身的場所。「陶之青聳聳肩，朝後一躺，窩在沙發跟牆壁交接的角落；伸手撥亮壁燈，橙黃的光，洩了一桌。『你知道我為什麼喜歡明星嗎？我喜歡這些小壁燈，這些笨拙的大理石桌面，讓你覺得很安全—』」（林懷民，1984：116）。光復初期的田園或是明星則是因為室內裝飾的風格的西化，桌上的那盞小壁燈便是對西方現代性的想望，是思想上安全的堡壘，哪怕只是小小的溫暖，也足以溫熱這些新知識份子的熱情。

1960-1970 年代從國民政府來台至解嚴之前，則是在新聞封鎖與白色恐怖下的威權體制社會下，「公共文化遂以社論、短評、寓言（political allegory）、嘲諷（satire）、反諷（irony）的形式呈現，這種批判的公共文化論述受媒體的圍繞、政治的威權民粹主義封殺，往往淪為知識份子茶餘飯後之閒話（gossip）與自我解嘲」（廖炳惠，2001：95）。咖啡館可以說就是這些“知識份子茶餘飯後之閒話與自我解嘲”之重要場所，在本研究分析文本中有許多這樣的敘述。由上所述，台北城市中的文化階級在 1930-1970 年之間歷經二度的認同危機，一是對於日本統治殖民之民族認同疑問，二是國民政府來台後，關於現代化與大中國意識之國家認同，這二度的認同危機使得台灣的公共領域，圍繞著“對於統治階級抗爭性與批判性”的議題左右。在 1930 年以後，台灣的公共文化就從抗爭型的公共文化轉為妥協的公共文化，百年來的殖民統治遂造成台灣人民傾向以個人利益為優先的態度（廖炳惠 2001）。1970 年代以後台北咖啡館消費文化的興盛，產生的社群認同的議題已不在“階級”上，而是在高度市場區隔的消費

型態下，各型態的咖啡館反而提供了不同身份者對於辨認自身的個人氣質與自我認同的消費方式－文藝之士仍有文藝型咖啡館、學生有學生的平價咖啡館、上班族有談公事的商業型咖啡館，各在不同的社會活動中，挑選符合其社會活動之空間情境的咖啡館。

無論如何咖啡館裡總是販賣著無數的希望與欲望，咖啡的氣味也轉喻著“幸福”的內涵。「咖啡總是和我站在一邊。喝完咖啡，我立刻有一整個世界要擁抱（或者，抵抗）。但此刻，我只是靜靜地喝下那一小口感覺，不管……咖啡入口之際，我只想充分感知那溫度，那香醇，那焦苦醇甘綿長柔密的力勁…」(張曉風，1996：227-228)，彷彿世界都不存在了，所謂存在也僅是淺嚐那香醇的剎那，瞬間即是永恆。咖啡的清醒作用與創作的的能力連結起來（作家們永恆的追求），咖啡的香氣也與浪漫的情調符合，子敏便說：「一杯咖啡是浪漫的象徵。無論你從哪一個角度觀察，寫作活動本身，本來就十分浪漫的²⁵」(子敏 1992)。尤其台北的咖啡館文化，自始以來皆是與西方的浪漫文學密切連結，縱使咖啡本來在西方是禁欲的象徵，到了台灣卻成為滿足創作慾望的催化劑。而味覺經驗所代表的“品味”，除了品味咖啡氣味所提供的愉悅感外，再加上如儀式般的喝咖啡過程（從選豆、烹煮、精美器皿、到優雅的動作），咖啡館當然的成為優雅生活的實踐場所。

本研究所蒐集的大量文本，不論是 1930-1970 年有關咖啡館文化的訪談，或是作家們回憶過去的年少生活的回憶錄也好，咖啡館在他們的文章裡皆留下了文人雅士的身影與生活情趣。我們在這些文章裡尋求蛛絲馬跡，以重新建構 40 年間的咖啡館文化，再文人作品呈現的咖啡館可歸類為三種象徵：(1) 文藝創作的天堂 (2) 文人雅士的社交中心 (3) 貧窮年代裡的奢侈消費。咖啡館被視為“文藝創作的天堂”與咖啡館一直以來與美術、文學活動（展覽、小型沙龍、發表會）有關，尤其是對目前已經享有盛名的藝術家、作家們（五十至六十歲這一代的文藝之士們）而言。正如雷驤先生的回憶裡，充分展現了喜好文藝的朋友在明星咖啡館裡社交與創作活動的繁盛，所以在這些人的文章中，總是有

²⁵ 原文刊載於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第二十五號。



意無意的遙想當年的盛況與過去文風頂盛的美好年代。當年泡在咖啡館裡的文藝青年其實也只是窮小子，只是因為想要浸濡在藝術與創作的氣氛裡，即使是喝清茶而不是咖啡也甘之如飴。

這些過往的記憶不僅成為文章裡動人的文采，更重要的是影響著後人們的嚮往。「郭從小就是一位愛幻想的女孩，在觀光護照尚未開放的年代，她就想看希臘和西班牙，後來光顧明星咖啡廳，倒並非真愛喝那杯『苦水』，而是她聽說，坐在明星咖啡廳的客人，一半以上都是作家和藝術家。她常常躲在一個角落裏，只是希望聽他們講話的聲音，欣賞他們的丰采，偶爾，只默默的看他們寫作、沉思的神情……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她開始沉醉在一個夢裏，她要自己開一家咖啡屋，所有她仰慕的作家藝術家都喜歡光顧牠的咖啡屋，為他們煮咖啡，端咖啡給他們……想到這裏，她禁不住興奮起來……」（隱地，1990：51-54）。從這裡可以看出文人所描繪的文學夢或是塑造的咖啡館情境，便轉借至一般大眾心目中，咖啡館成為實踐夢想的開始。這些文章中所傳遞的幸福感，深深植於讀者心中，讀者參與了文本的建構，透過讀者在咖啡館的現身，將幻想與真實的慾望想像同時投映在咖啡館中。所以現代人便在咖啡館、在台北這個都市裡，尋找對於所居住空間的歸屬與認同。人們可以在其中編織夢想，作著所謂獨立不受人掌控的自由生活之夢，於是“咖啡館”亦被文學神化（咖啡館神話）：「不管你的心受了多大傷害，不管你受到什麼挫折，讓我們繼續作夢……何況到處有溫馨的咖啡屋，一股咖啡濃香正自遠處飄來，……讓我們去歇歇，讓我們進去喝杯咖啡，或者做個夢吧！」（隱地，1992：210）。這種關於自身夢想的慾望，投射在對於咖啡館的想像裡，人們在咖啡館中書寫、討論、冥想，都是在塑造與建構自我，所以，咖啡館是一個讓“事情自己發生（being）的場所”。當咖啡化身為“夢想”、“幸福”、“自由”、“傳說”時，咖啡館似乎就不同於一般的小店，咖啡館成為可遮蔽俗世紛擾的城堡，保衛著人所僅有的一點的真心：於是，咖啡館成為城市裡最後的精神堡壘：「只剩下咖啡館了，在咖啡館想著我們失去了家，失去了可以長久待著也不會膩的家的感覺，失去了家裡可以可以不受打擾城堡式安全安心……」（楊照 1997）。咖啡館是文人夢想中的烏托邦，更是台北匱乏文明中唯一的救贖地。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 子 敏（1992），〈約會在朝風〉《愛喝咖啡的人》，pp.210，原文刊載《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 小山操，《台北市大觀》，台灣大學圖書館特藏室，光碟編號 2205683
- 方孝謙（2001），《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台北：远流
- 王秀瑩（2000），《咖啡連鎖店市場區隔及其消費行為之研究》，東華企業管理系碩論
- 王紹光（1991），〈關於市民社會的幾點思考〉《二十一世紀》，No.1，pp.102-114
- 王詩琅（1934/1991），〈夜語〉，台灣作家全集《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
- （1935/1991），〈沒落〉，台灣作家全集《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
- （1936/1991），〈十字架〉、〈邂逅〉，台灣作家全集《王詩琅、朱點人集》，台北：前衛
- 王德威（1998），《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北：麥田
- 丘彥明（1985），〈從「玻麗露」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館探索〉《報導文學》，pp.174-189
- 白先勇（1984），〈明星咖啡館〉《明星咖啡館—白先勇論文雜文集》，台北：皇冠，pp.63-67
- 伊 里（1994），〈本土咖啡館六十年〉《咖啡館》，《誠品閱讀》人文特刊，pp.54-58
- 江述凡（1997），〈朝風 野風 音樂風—台北最早古典音樂咖啡館〉《中央日報》，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 余崇齡（1994），《光復後台灣室內設計變遷之初探—以外來因素影響為主 1950-1980》，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論
- 李 昂（1995），〈一封未寄的情書〉《1984 年台灣小說選》，台北：前衛，pp.40-70
- 沈樹華（1999），〈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理論〉《公民訓育學報》，



Vol.8, pp.553-582

周英雄、劉紀蕙編（2000），《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

林以青（1993），《文學經驗中的都會情境轉換之探討—以五〇至七〇年代台北市為例》，東海大學建築系碩論

林正盛導演（1999），《天馬茶房》電影，台北：青蘋果製片

林吟春（2000），《咖啡連鎖店消費者行為之研究——以台北市咖啡連鎖店為例》

林宜屏（2000），〈辯士詹天馬〉《卓越》台北：卓越雜誌，NO.4，pp164-169

林義凱（1997），〈咖啡人的終極歸宿〉《聯合文學》，Vol.13，no.9

林懷民（1968），〈變形虹〉，台北：順益

（1984），《蟬》，台北：九歌

邱坤良（1992），《舊劇和新劇：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台北：自立晚報

邱琳婷（1999），《台灣美術評論全集：謝理法》，台北：藝術家

姜捷（1985），〈一頁咖啡色文學〉《報導文學》，pp.193-197

室內雜誌（1997），〈從明星咖啡到網路咖啡：台灣咖啡館發展走向推論〉《室內》，Vol.2. No56，pp.120-129

施麗薰（1998），〈夢在咖啡飄香 台灣老咖啡館足跡〉《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七年九月十三日

胡品清（1975），《胡品清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

范婷（2000），〈從波麗露到星巴克—台灣咖啡文化的歷史分析〉，《傳播文化》，no.8，pp.41-77

夏鑄九（1993），《理論建築—朝向空間實踐的理論架構》，台灣社會研究叢刊

（1994），〈（重）建構公共空間—理論的反省〉《台灣社會研究季刊》，No.16，pp.21-54

（1997），〈再理論公共空間〉《城市與設計學報》，No.2-3，pp.63-76

晏琪（1985），〈作家咖啡屋瑣談〉《報導文學》，pp.190-197

秦松（1994），〈作家咖啡屋〉《咖啡館》，《誠品閱讀》人文特刊

- 高大鵬（1992），〈飛來樹的見證〉《繁華猶記來時路》，台北：中央日報，pp.199-207
- 商 禽（1992），〈咖啡瑣憶〉，《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 張曉風（1996），〈這杯咖啡的溫度剛好〉《這杯咖啡的溫度剛好》，台北：九歌，pp.227-228
- 莊永明（1989），〈人物介紹—詹天馬〉台灣文化資訊站
<http://daiwanway.dynip.com/tw/songwriter.txt>
- （1992），〈大稻埕食的文化〉《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 莊永明文、林衡哲編著（2001），〈台灣文化園丁—玉井泉〉《二十世紀台灣代表人物（上）》，台灣：望春風文化，pp.26-45
- 許俊雅（1995），《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台北：文史哲，pp.108-126
- 陳其澎（1998），〈身體與空間：一個以身體經驗為取向的空間研究〉，《設計學報》第一卷第一期
- （2000），〈咖啡館的文化形式之研究〉，未出版
- （2001），《以身體經驗為導向的城市空間研究》，國科會研究計劃
- （2001），〈台灣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建構與質變：以南投縣集集鎮的社區總體營造過程為例〉《環境與藝術學刊》，Vol.3
- 陳映真（1997），〈一個私的歷史之紀錄與隨想〉《台北記憶》，pp.68-73，台北市政府
- （1999），〈台北斷想〉《台北畫刊》，No.377，pp.20-23，台北市政府
- 陳秋盛（1997），〈台北音樂紀事〉《台北記憶》，pp.56-57，台北市政府
- 陳若曦（1997），〈柳綠鵲紅琉公圳〉《台北記憶》，台北市政府，pp.30-31
- 陳雪慧（2000），〈一位資深記者對二二八現場的回憶〉《明日報》，www.tTimes.com.tw，2000/2/26，二岸華人版
- 陳芳明（1998），《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
- 曾長生（1999），《台灣美術評論全集—李仲生卷》，台北：藝術家
- 曾慶豹（1998），《哈伯瑪斯》，台北：揚智
- 湯皇珍編（1994），《陽光、印象、楊三郎》，台北：雄獅圖書
- 黃湘娟（1999），《見證台灣室內設計 25 年》，台北：美兆文化
- 楊 照（1997），〈只剩下咖啡館 只剩下星期一〉《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楊守愚（1931/1991），〈一群失業的人〉，台灣作家全集《楊守愚集》，台北：前衛出版社
- 楊雲萍（1927/1990），〈加里飯〉，台灣作家全集《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
- 雷 驤（1996），〈咖啡室的啓蒙〉《黑暗中的風景》，台北：爾雅，pp.57-63
- 廖炳惠（1993），〈導讀：中西女性與公共領域〉《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季刊》，Vol.38，pp.13-17
- （2001），〈當代公共文化的回顧與展望〉《文化與權力---台灣新文化史》，pp.81-106，台北：麥田
- 劉大任（1985），《浮游群落》，台北：遠景
- 劉進慶等（1992），《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出版
- 蔡文芳（2000），〈星巴克人的誕生：都市咖啡消費空間解讀〉《師大地理研究報告》，No.32，pp.147-169
- （2001），《跨國娛樂資本的空間生產—以台北星巴克為例》，師大地理研究所碩論
- 鄭秀香（2001），《台北市咖啡連鎖店顧客滿意度之研究》，文化生活應用研究所碩論
- 蕭新煌（1990），《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
- 賴 和（1935/1991），〈赴了春宴回來〉台灣作家全集《賴和集》，台北：前衛
- 戴育賢（2000），〈重返公共領域：哈伯瑪斯、女性主義、羅述、文化研究〉《新聞學研究》，No.62，pp.119-142
- 謝理法（1997），〈童話大稻埕〉《台北記憶》，pp.4-9，台北市政府出版
- （1998），《台灣美術運動史》，台北：藝術家
- 隱 地（1979），〈純喫茶〉〈一個叫莫尚勤的年輕人〉《幻想的男子》，台北：爾雅
- （1992），〈愛喝咖啡的人〉《愛喝咖啡的人》，pp.85-101，台北：爾雅
- （1990），《隱地極短篇》，台北：爾雅
- 羅珞加（1994），〈我在文藝沙龍〉《咖啡館》，誠品閱讀人文特刊
- 嚴娟英編著（1998），《台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台北：雄獅圖書

【報章雜誌文章無標示作者】

- (1934), 《台灣日日新報》, 〈大稻埕顯著現代化, 咖啡館林立, 常設劇場的誕生〉, 昭和九年三月六日 (1935/2/21-5/31)
- (1965), 《台灣日報》, 〈中國之友社, 並不友好〉, 民國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 (1942), 《興南日報》(1942 年 3 月 31 日)
- (1928), 《台北市六十餘町案内》, 台北: 世相研究社
- (1943), 《台北商工名錄》

西文書目

- Ackerman, Diane (1990/1993),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 N.Y.: Random Books. (《感官之旅》, 莊安祺譯, 台北: 時報出版社。)
- Bachelard, Gaston (1994), *The Poetics of Space*, Boston: Beacon Press
- Baudelaire, Charles (1984),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Paidon
- Bauman, Zygmunt (1994),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N.J.: New Brunswick
- Bradshaw, S. (1978), *Café Society*, London: Weidenfeld & Nickolson
- Braudel, F. (1979/1999),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15-18 siècle : Les Structures du Quotidien : Le Possible et L'Impossible*, Paris : Librairie Armand Colin. (《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結構: 可能與不可能》, 卷一, 台北: 貓頭鷹。)
- Chris Jenks (1993/1998), *Culture* (《文化》, 俞智敏等譯, 台北: 巨流。)
- Corbin, A. (1998), *Village Bells: Sound and Meaning in the 19th-century French Countrysid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owan, B, W (2000), *The Social History of Coffee: commercial Culture and Metropolitan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600-1700*,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 Douglas, Mary (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 London: Ark.
- Ellis, A. (1956), *The Penny University : A History of Coffee-Houses*, London: Secker & Warburg
- Foucault, Michel (1965), *Madness &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N.Y.: Vintage Books.
- (1977), *Discipline &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Y.: Vintage Books.
- (1980), Colin Gordon (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 &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1980/1992), "The Eye of Power," in C. Gordon (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pp.146-165.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權力之眼〉, 王志弘譯, 《當代》, 74: 97-115)
- (1980/1995), "Body/Power", in C. Gordon (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pp.55-62 (〈身體/權力〉, 王志弘譯, 《性別、身體與文化譯文選》, pp.94-111, 自印)
- (1986) "Of other space," *Diacritics*, 16(1) (spring): 22-7. (〈論異類空間〉, 王志弘譯, 未出版)
- Friedman, J. (ed.) (1994) *Consumption and Identity*, Switzerland: Harwood.
- Gaonkar, Dilip (1995), 〈圓形監獄與公眾性：邊沁對透明性的追求〉, 吳桂枝譯, 收於廖炳惠編, 《回顧現代文化想像》, pp.144-173, 台北：時報
- Habermas, J. (1990/199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IT Press,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曹衛東等譯, 上海：學林出版社)
- Jary, D. & Jary, J. (1999), *The HarperCollins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社會學譯典》, 周業勤等譯, 台北：貓頭鷹出版)
- Jenks, Chris (1993/1998)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文化》, 王淑燕等譯, 台北：巨流)
- Joel, D. & K. Schapira (1975), *The Book of Coffee & Tea: A Guide to the Appreciation of Fine Coffee, Teas and Herbal Bevera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Negt, O. & Kiuge A. (1993), *Public Sphere and Experience: Toward an Analysis of the 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 Public Sphe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O'Connell, Peter J (1991),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Lopedia*, (《社會學辭典》, 彭懷真等譯,

台北：五南出版)

Pernoud, R. (1985/1991), *La Bourgeoisi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資產階級》，黃景星譯，台北：遠流)

Pollock, Griselda. (1988/2000), "Modernity and the Spaces of femininity", in *Vision and Difference*, pp. 50-90, London: Routledge. (〈現代性與陰柔氣質的空間〉，《視線與差異》，陳香君譯，pp.81-144，台北：遠流。)

Robert Bocock (1993/1995), *Consumption*, (《消費》，張君玖、黃鵬仁譯，台北：巨流圖書)

Schivelbusch, W. (1993/2001), *Tastes of Paradise: A social History of Spices, Stimulant, and ntoxincants*, New York: Vintage, (《味覺樂園——看香料、咖啡、菸草、酒，如何創造人間的私密天堂》，殷麗君譯，台北：藍鯨)

Sennett, Richard. (1990/1995), *The Conscience of the Eye*, New York: Alfred A. Knoff, (〈眼睛的良知：導言〉，王志弘譯，《空間與社會理論譯文選》，pp.28-30，自印)

(1976/1992),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W. W.Norton London: Croom Helm

(1994), *Flesh and Stone: They 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N.Y.: Norton &Co.

(1994/1995), "The power of the eye." in Russell Ferguson et al. (eds), *Urban Revisins: Current Projects for the Public Real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pp.59-69; (〈眼光的力量〉，《空間與社會譯文選》王志弘編譯，台北：唐山，pp.31-44)

(1988), "The Civitas of Seeing", *Place*, Vol.15, No.4, pp.82-84, (〈觀看的城市〉《空間與社會譯文選》，王志弘譯，pp.22-26，自印)

Stallybrass, P. & A. White (1986),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transgression*, London: Methuen

Wright, Gwendolyn, and Paul Rabinow. (1982 /1994). "Spatialization of power: A discussion of the work of Michel Foucault," *Skyline*, March, pp.14-5. (〈權力的空間化：米歇•傅寇作品的討論〉，陳志梧譯，收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pp.411-427，台北：明文書局。)